

博瞻而通贯 求劬而获创

——张俊教授访谈录

曹立波

张俊先生,1935年8月生,山西祁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所著《清代小说史》是一部首次对明清之际和清代小说由点到线进行系统论述的断代小说史,主持《程甲本〈红楼梦〉校注》和《新批校注〈红楼梦〉》(程乙本)工作,倾三十年之力,对两部《红楼梦》早期刊本予以精审的校注和学术角度的评批。《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考论》、《程本红楼语词校读札记》系列论文等,涉及《红楼梦》版本与文本等诸多方面。本刊特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博士就相关问题采访张俊先生,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曹立波 您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和《红楼梦》等世情小说方面有着广泛的研究,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委托,想就《清代小说史》的编写、世情小说的研究以及《红楼梦》的评注等有关学术问题对您作一次访谈。

张俊 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诚挚邀请。研究领域之“广”似乎谈不上,我只是觉得,在古代小说史研究、世情小说研究,以及《红楼梦》等小说的校注、评批等方面的确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借此机会漫谈一下吧。

一、《清代小说史》的特色与贡献

曹立波 编写中国古代小说的断代史,一般来

讲,都是以一个历史朝代或几个朝代的组合为时代断限的。而在小说史的开篇,大都直接步入相应的历史阶段,比如《汉魏六朝小说史》开篇是“汉代小说”,《隋唐五代小说史》开篇是“隋代小说”,这应是常态的考虑。您在写《清代小说史》时,为什么没有从清代初期开始,而是在开篇设置了“明清之际小说”这一章节呢?

张俊 这出于对朝代鼎革时期,也就是“夹缝”时期文学现象的关注。我先由十几年前的一道试题说起吧。一次,为招考明清小说方向博士生,我出了这样一道试题:“论述明清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题意是想考察学生对历史分际之点文学的认识和掌握情况。考试结果,不尽如人意。有的答案,割裂历史,只知明而不

知清,或者相反;有的混淆时代,作品错位,张冠李戴。究其原因,这与我们过去一些文学史著作习惯以历史朝代断限,而不太重视所谓“夹缝”时期文学的研究不无关系。

我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源于教学实践,也与当时学术研究的趋向有关。在我撰写《清代小说史》的同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对明清之际学术文化的研究。如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中国两千多年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并特别强调:“明清易代既是我国社会历史的转捩点,也是理解华夏学术思想嬗变的一个枢纽。”具体到文学史,陈伯海先生《中国文学史之宏观》提出:“中国文学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一为周秦之交,一为唐宋之交,一为明清之交,它们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郭国平、王镇远先生《清代文学批评史》尤醒目地将“明清之际”(由明入清和顺治年间)列为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阶段,予以论述。

我过去曾与沈治钧合著过一本小书《清代小说简史》,按照丛书的编写要求,依历史朝代,习惯地将其上限定位于顺治元年,当时亦甚感太拘泥于朝代纪年,而割裂了小说之发展,一些作家作品,人为分为两截,不易描述,颇为疑虑。有鉴于此,我们曾合写过一篇《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收获和新问题》的文章,其中对明清小说史的断限问题谈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后来我重写《清代小说史》乃另列一章,题为“明清之际小说——明崇祯至清顺治”。理由有二:一方面,这一时期作家,大都生活于明末,入清以后,仍从事创作,有些作家,如《西游补》作者董说、《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等,把自己的沧桑之感、亡国之痛贯注于创作之中,取得更大成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既有因袭,也有革新,正处于因革之际。一些传统的小说流派在发展变化,如历史演义小说,有近三十种,其中有十多种为当时新出现的演述当代历史的时事小说,明崇祯、清顺治两朝,各有七八种,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警世阴阳梦》,刊刻于崇祯元年;《樵机闲评》开始写作,当在明亡之前,成书则不会早于崇祯十七年,而《樵史通俗演义》,则写成于顺治年间。这十多种作品所

反映的社会矛盾和作家心态,有其连续性,不应强为分割。神怪小说,约计六种,多为传统题材,但《西游补》则显示出由佛道类向寓意类作品嬗变的倾向。同时,尚兴起一新的小说流派,即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约六七种,此后风行一时,绵延至清末。其他如话本小说,约有三十余种,崇祯十二种,顺治二十多种,其题材与叙事体制,均有突破,继“三言”、“二拍”之后,又掀起一创作热潮。从中国小说史发展看,如《文心雕龙》所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明清易代之际文学,正当沧海桑田的变迁时代,亦处于“参伍因革”之中。

曹立波 您的学术研究,教师的职业特色十分明显。您关注明清之际“夹缝”时期文学的理念,源于教学实践,通过理论提升,对学生又产生了影响力。《清代小说史》199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行,之后,您所指导的几届学生的博士论文总有与明清之际的小说、小说作家,乃至与诗文有关的选题,如《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1999)、《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2001)、《卓尔堪的移民诗》(2002)等。当然,这部小说史本身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以《清代小说史》等为话题,郭英德先生曾撰写一篇题为《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上。郭先生从数字统计入手,指出以往的小说史类似“名著赏析的集成”,而《清代小说史》中名著所占的比例比其他小说史明显减少,进而分析道:“数十年来,名著的赏析所形成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还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明清小说史写作者对其他小说史现象的关注……然而,明清小说史决不仅仅是作家作品史,还是作家创作史、作家文学活动史、作品流传史、读者接受史。因此,悬置名著,便有助于研究者抛弃静态的小说史观照方式,而关注小说生成、展开、转换的动态历史,考察并描述小说生产、传播、消费的复杂过程,接续种种缺失的小说史环节。”您能具体说说在《清代小说史》撰写过程中对于名著与文学史的关系,对于“一流”与“二流”、“三流”的小说的关系,所采取的观照方式吗?

张俊 我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论从史出。注意处理好这样两个关系:一是作家、作品与史的

关系。作家、作品的研究,实际是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和基础。应注意在作家、作品的归类、比较中,别抉异同,显现因革,揭示其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使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升为“史”的高度,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尤其是应注意对大批中小作家及所谓二三流作品的梳理、考察,以凸显他们对一些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烘托和铺垫作用,从而梳理清楚众多小说流派的形成、特征、发展、影响和地位。比如清代的世情小说,除其典范之作《红楼梦》及二流作品《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外(姑且如此定位),其他作品,尚有三十余种,如众星拱月,恰形成明清之际《醒世姻缘传》和世情小说的衍变、清前期《林兰香》和世情小说的发展、清中叶《红楼梦》和世情小说的高峰及清末世情小说的衰落这样的衍演轨迹。二是视角与构架的关系。视角可以有主有从,可以多元,但作为小说史,理当遵循时间线索,注意历史的序列性。当然,具体操作时,应结合小说创作实际,注意灵活掌握,不可能强求整齐划一。

曹立波 作为富有时代标志性的文体,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皆可谓“一代之文学”。小说文体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共同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一些重要的题材、流派,比如贯穿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您在撰写清代的小说史时,是否要考虑与明代的接续关系?

张俊 考虑过,因为明清两代的小说联系密切,而要写清代小说的断代史,我们不能不强行切断许多小说流派的发展脉络,致使历史线索缺少了整体的连续性。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收获与新问题》小文中,就列举了一些作品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世情小说,自《金瓶梅》产生,至明末清初《醒世姻缘传》和《续金瓶梅》的沿袭,再至清初《林兰香》的中转,最后发展至清中叶以《歧路灯》、《蜃楼志》特别是《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高峰,其线索是连续的,不宜割断;《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巨著的‘链环’也是环环相扣的,不宜拆散。近年,又有学者发现明末世情小说《玉闺红》并未失传,认为该书内容丰富深刻,艺术精湛,‘就其反映市井生活的广阔深刻而言,堪称《金瓶梅》的姊妹篇’(刘辉、薛亮《明清稀见小说经眼录》)。如此,则世情小说在明末的发展线索就更为

明晰了。现在,我们将这一完整的线索从《醒世姻缘传》处切断,就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刚才我们谈“夹缝”文学是从小说史的时代断限角度讲的,而进入了某一限定的文学史阶段的话,我们则应考虑作品之间的“链环”关系。

二、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体察世情小说的流变

曹立波 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流派有专门的研究,为研究生开设过《中国古代小说流派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等课程。关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题材的小说都有专门的论述。这对弟子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我所知,您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各类题材都不乏专论,像纪德君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1997)、胡胜的《明清神魔小说研究》(1998)、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1999)等。当然,您个人的研究领域中著述较多的应是世情题材的小说,能谈谈您的研究视角吗?

张俊 相比之下,我在世情小说方面投入的精力稍微多一些。基本是围绕《金瓶梅》与《红楼梦》展开的。三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后来被一些有关的论文集收录。需要说明的是,某出版社编辑的《〈金瓶梅〉资料汇录》,将题目改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我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与”和“从……到”,有点和线的区别。我后来的研究,对整个世情小说这个发展过程关注多一些。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的切入点,可以用“两点一线”来概括。首先是关注明清世情小说的两个起讫点《金瓶梅》和《红楼梦》,进而从“线”的角度去考察两点之间的链环,即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中间环节。

曹立波 结合世情小说的发展这条“线”,您对《金瓶梅》、《红楼梦》对前代小说的继承和突破都给予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能在这里简要谈谈吗?

张俊 我们先看看《金瓶梅》对它以前小说的突破,这主要集中在选材上,即选取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并塑造了一大批妇女形象。在与前代小说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金瓶梅》的题材由写历史兴亡

到写一个家庭的盛衰,由写英雄起义到写个人的荣枯和闺阁的纷争,由写神魔斗争到写世俗琐事,这是一个很大变化。一个家庭和历史事件比较,个人的荣枯和英雄起义比较,神魔斗争和世俗琐事比较,好像空间缩小了,矛盾斗争也减弱了,但是,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则拉近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更深入了。从《金瓶梅》起,中国古典小说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有了提高。并且其态度也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中对妇女的批判逐步过渡到《林兰香》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对妇女的肯定及《红楼梦》对女子形象的赞美。

就《红楼梦》对《金瓶梅》题材的沿革来看,虽然这两部小说所写的都是家庭生活,但是《红楼梦》之于《金瓶梅》,在继承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一是《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共有上下五代人,重点描写的是第三、四、五代,较之西门一家的单薄,贾府显然是一个更加完整的家族。二是两本书对于家族兴衰史的描写有所不同,《金瓶梅》重在写西门庆发家的过程,而《红楼梦》重在写贾府衰败的过程。这种转变应该与清代的末世情结有关,结合《长生殿》、《桃花扇》和《儒林外史》几部戏曲小说结尾的描写,就可以知道,这是清代文学作品的共同之处。三是《金瓶梅》中对妇女抱有一定的偏见,而在《红楼梦》中更多的是肯定,是颂扬。除了题材上的发展外,《红楼梦》在情节结构上比之《金瓶梅》也有发展。与明代其他“三大奇书”相比,《金瓶梅》的情节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全书首尾相联,血脉贯通,难以分割。故事主体,是写西门庆家发迹和败亡的过程,以及家庭中妻妾的矛盾和争斗。故事主要是以西门庆的一生串起来的。到了《红楼梦》则更进一步,从一条主线发展成为一主一副,即宝黛钗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贾府的兴衰为副。

此外,《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在艺术手法上都有创意。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两书都喜欢用“蹠着门槛子”、“嗑着瓜子儿”的习惯用语来描摹人物神态,刻画人物心理。在《红楼梦》中,还有一个特殊用语是“抿着嘴儿笑”。脂批抄本凡十四见,程乙本则二十四见。其中除两处用于男性,一处用于邢、王二夫人,一处泛指众人外,其余多用于青少年女性,尤以黛玉最多,共计五例。记得十多年

前,一位来自邻邦日本的女青年访问学者问我:“抿着嘴儿笑”是什么意思?我请她先查辞书。她说:“查过《现代汉语词典》,但还是不懂。问我能不能画图说明。我告诉她,我不懂绘画,画不出来。再者,这一词语,《红楼梦》用过多次,虽然各人‘抿着嘴儿笑’的神态似乎一样,但所表达的情致,所反映的心理,却并不完全相同。只有结合书中具体语境和人物关系,仔细玩味,才能慢慢体会。这正如王安石《明妃曲》所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后来偶然读到英国皮斯等著《身体语言密码》一书,有一节列出“五种常见的微笑”,第一种就是“抿嘴笑”,并附有照片,说明女性的这种微笑,“意味着她心中有不愿与你分享的秘密”。《红楼梦》中种种“抿嘴笑”背后有何“秘密”,也应该察远烛幽,仔细揣摩。这些细微之处,当也是《红楼梦》魅力所在吧。

曹立波 我们常讲《红楼梦》从《金瓶梅》发展而来。从俗到雅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些中间环节。当然,《红楼梦》艺术世界,如百川归海,其支派中应包含小说、诗歌,甚至戏曲等多种元素。如果只从一般小说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红楼梦》的艺术渊源,明末延至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似乎是很重要的小说题材,尽管曹雪芹在小说中曾激烈批评过才子佳人小说文君子建、千部一腔的创作弊端,但从小说文学发展的整体看,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前代文学,对《红楼梦》的创作不无影响。其中对才、情、貌兼美的“佳人”形象的强调,对《红楼梦》的影响应该是有迹可寻的。您也曾关注过才子佳人小说,记得您写过《漫说〈定情人〉中的情》,还写过《论〈林兰香〉与〈红楼梦〉——兼谈联接〈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链环”》,您如何看待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的关系?又如何确定联接《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真正的“链环”呢?

张俊 到底是什么小说把《金瓶梅》与《红楼梦》联接起来的呢?以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说,这个“链环”就是明末清初文坛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并以为《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对此,我起初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进一步考察比较之后,我又有些疑惑了。因为两相对照,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都有不少相悖之处,似难联在一条线上。把《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巨著联接起

来的“链环”,我认为应该是世情小说,自明崇祯至清乾隆年间《红楼梦》问世前,这类小说约出现十五六种,具体代表作品是《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我在90年代初写的一篇《论明代世情小说》的文章中,曾对明代世情小说的渊源、发展及其衍化作过一些介绍。后来在《清代小说史》“明清之际小说”一章中,专设“世情小说的衍化及种类”、“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及其原因”两小节,对这两类不同的小说流派分别作了简要描述。在描述前者时,我引录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话,他说:“人情小说萌发于唐,迄明略有滋长……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我认为,这一论断是符合小说史实际的。你提到的那篇兼谈“链环”的文章,乃是以《林兰香》与《红楼梦》两书为实例,具体阐述一下这一问题。我从立局命意、取材角度,以及结构方法、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比较,发现同为一种“世情书”,《红楼梦》与《林兰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与《金瓶梅》相比,《林兰香》在塑造正面形象、肯定儿女真情、显扬女子才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有专家曾指出,《林兰香》在明清世情小说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承前启后的意义。这种文学现象,是很值得探讨的。

曹立波 从世情小说发展的两个起讫点来看,《金瓶梅》是开山之作,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是清中叶,为什么后来的百余年间,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可与《红楼梦》相伯仲的长篇世情书来呢?换句话说,《红楼梦》之后世情题材的小说为何没有形成创作潮流?

张俊 这也是我曾困惑的问题,后来将几点思考写进了《清代小说史》中。我想,清后期世情小说衰落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其一,清末社会巨变迭生,需要批判现实力度较强的作品。与谴责小说等相比,世情小说便显得婉曲而欠直截,冷静而乏激情。其二,世情小说出现晚而成熟早,开山之作《金瓶梅》已具有很高水准,《红楼梦》更登上了古代小说思想艺术的最高峰。它们给后人留下的机会已经很少,后来者只好另辟蹊径,世情小说遂分化、蜕变为其他类型的小说。其三,清后期大部分作家缺乏创新意识,将世情小说创作引入了死胡同。继《红

楼梦》之后,出现了一批平庸的续书和仿书。作者不是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结撰故事,而是根据主观愿望向壁虚构,完全背离了世情小说的写实传统。其中以《红楼梦》续书为最多,质量却较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缺乏创新意识的“续红”者,断送了一个卓越的小说流派。

三、《程甲本〈红楼梦〉校注》精审详实的注释

曹立波 从您为博士生开设的《红楼梦》专题课上,收获的不仅仅是作者、版本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每一个问题,您都鼓励我们将论据资料还原到第一手文献上去,回归到原始古籍上去。我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的撰写,涉及版本和评点研究,您在文献的处理和文论的把握上分别给予了具体的指导。我以为,这应该源于您三十年来对《红楼梦》详注、精评的学术积淀。

据我所知,《程甲本〈红楼梦〉校注》,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程甲本为底本校注的。启功先生任顾问,您负责注释和全书的统稿工作。这部书刚一问世,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美国《华侨日报》等近十家报纸都作了报导和评介,并获1989年第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书中校注共4165条,约65万字,占全书字数近一半。我曾给一些学生推荐此书,他们的读后感是,有的章回注释比正文都多,便于导读。吕启祥先生在《填空补阙,厚积薄发——读北京师大〈红楼梦〉校注本》一文中对校勘、注释做了全面评价,认为此书“广参博览,锐意穷搜,成为当今《红楼梦》注释中最详备丰富的一种”。您当年是怎样想到要从事这项工作的?

张俊 这部书的校勘和注释整理工作,开始于1982年,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古籍整理丛书”,约请我们重新校注一部《红楼梦》。应出版社之约,我们在启功先生主持下,拟定了校注这部书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校注细则和编排体例。到1987年出版,历经五年的时间。其实,此书注释部分的工作,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时我们曾经编印过两册《红楼梦注释》(前八十回)油印稿,作为教学辅

助材料。那个本子,是在启功先生撰写的人民文学版《红楼梦》所附注释的基础上增补扩充而成的。当时参加过部分注释初稿工作的还有李长之、王汝弼、韩兆琦等先生。在征求意见时,一些专家和读者,曾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嗣后,经初步修改,并补注了后四十回,于1975年排印出版,分装两册,内部发行。“文革”之后,我们进一步查阅了一些资料,于1979年,又对注释原稿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删汰了一些评语,订正了一些讹误,增注了一些词条,并请启功先生写了序言,准备正式出版。参加这次注释修改的是我和聂石樵、周纪彬先生。后迁延三年,书稿未出,1982年纳入北师大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当时我们决定以解放后未曾整理出版过的程伟元乾隆辛亥活字本(简称“程甲本”)作底本,进行校勘,排印出版。意图为红学研究者、爱好者多提供一种可取资的版本,为大专院校《红楼梦》的教学提供一种参考读物。同时决定改写注释,除订正旧稿中的一些讹误外,重点是扩充条目,重新加注,增补资料,丰富注释内容,以增强注释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尤其是对与小说内容有关的一些朝章典制和风俗习尚等词语,也注意结合文意,征引史料,加以阐释,以有利于读者更深入认识《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增加阅读兴趣。

曹立波 这项校注工作,尤其是注释,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积累。吕启祥先生总结得好,她说:“这里所说的积累,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时间上的,这项工作始于1974年,而且经过了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当年参加此项工作并为之付出了辛劳的李长之、王汝弼先生已经作古,而工作不仅继续,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指锲而不舍、集腋成裘的精神。注释工作最需要‘有心人’,许多材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时时在心、处处留心,才可能将零散的不为人瞩目而又恰恰为注释所需的材料收集起来。”吕先生曾在北师大工作过,了解此版本校注的辛苦历程。在书评中,她特别肯定了您的贡献:“张俊同志自始自终负责注释编写和定稿工作,用力最多,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广泛涉猎、随时留意,对注释的不断充实和最后定稿,做出了贡献。”您能具体谈谈当年在注释这部长篇小说、这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相应的对策吗?

张俊 注释基本完稿后,我曾写过一篇《红注刍议》的文章,结合实例,比较全面谈了我对《红楼梦》注释的一些体会和想法。大家知道,解放后,到上世纪80年代,《红楼梦》的注释已出过多种,这不仅为广大读者阅读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许多方便,而且也开拓了红楼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当时的想法是,红楼注释工作也同评论工作一样,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提高,有所突破,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校注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应该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

我们注意到《红楼梦》是一部古代白话长篇小说,小说的特点是“因文生事”、“虚实相半”。那么,它的注释,比起经史典籍的注释来,也就有很大的灵活性。如关于历史人物的注释,倘是注史籍,就必须严守史实,对人物做全面评价,但如是注释小说,则可结合故事情节,有虚有实,酌情而定,灵活掌握。如第二回,贾雨村把人分为大仁、大恶和善恶相兼者三类,其中包括作家在内的历史人物共有四十五人。对这些人物,既不必全面评价,也不应笼统说明,而应结合小说的描写,或钩稽史实,或依据传说,重点突出他们生平事迹和思想性格的某一方面,加以注疏。如“始皇”,小说把他归之为“应劫而生”的恶人,若全面介绍,难免全而无当,如只注“始皇即秦始皇”,又嫌泛泛,注了等于不注。应该是依据一些旧史记载,说明他的秉性刚戾,为政以刑杀为威,所以世有“暴秦”之称。又如“阮籍”,如果只说他是“魏晋之际的诗人”,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依据其本传及有关杂著,注明他嗜酒荒放、不拘礼俗、不乐仕宦、时人多谓之“痴”的性格特点。又如第三十回宝玉拿宝钗比杨妃,宝钗大为不快。小说在此借杨妃肌肤丰腴,比喻宝钗的体态。这一比喻,语出有据,见明人陈耀文《天中记》卷二一引《杨妃外传》。第三十七回宝玉《咏白海棠诗》有句云“出浴太真冰作影”,以杨妃出浴比喻白海棠的洁净。这一比喻,也见于前人诗文。《类说》卷四八引《墨客挥犀》云:“彭渊材作《海棠诗》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总之,“杨妃”的用典,或由附会而来,或出自古诗,或化用戏文,灵活多样,与小说所写“事体情理”无不相合。关于词语的注

解,也应注意它的灵活性。如第二十四回有“帮衬”一词,当“帮助”讲。《醒世恒言》作了这样的解释:“帮者,如鞋之有帮,衬者,如衣之有衬。但凡做小娘的,有一分所长,得人帮衬,就当十分。若有短处,曲意替他遮护,更兼低声下气,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讳,以情度情,岂有不爱之理?这叫做帮衬。”这是否就是“帮衬”一词的语源?恐怕难说,这里没有必要去追诂。作为小说《醒世恒言》不妨姑妄言之,读者也就不妨姑妄听之了。

我以为给一部小说作注,目的不应限于为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提供便利,减少障碍,更重要的还应尽可能对读者了解作家意图、认识作品的思想价值、欣赏作品的艺术特色,有所帮助,有所启迪。为此,在选择注释词目和拟写注文内容时,除顾及小说的一般“共性”外,还需要考虑它的“个性”,即充分注意这部小说所独具的特点和性质,以确定注释的重点和难点。如《西游记》为神魔小说,则宗教释道的注释,应是重点;《金瓶梅》为人情小说,则社会情状的考释,应是其重点;《儒林外史》为指撻“士林”的讽刺小说,则科举典章的疏解,应是其重点,等等。至于《红楼梦》,论者都称举它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先生把它归于“人情派”,称之为“世情书”。这是有道理的。当然,同为人情小说,比之《金瓶梅》,《红楼梦》的内容更为细致精微,宏富深沉。这就使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时的障碍更多,也给注释带来更大困难。但是,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有关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名物故实以及难解之语,尽可能作些阐释,却是对读者大有裨益的。

曹立波 说到典章制度,记得启功先生在此校注本的《序》中针对“官制问题”,曾加以强调说:“作者所避忌露出的清代的特点中,官制方面尤为严格。凡是清代以前有过而清代也沿用的,便不属清代特有,才出本名称;凡清代特有的,一律避开。像‘龙禁尉’、‘京营节度使’等等,不但清代没有,即查遍《九通》、《二十四史》,也仍然无迹可寻。”那么,由官制推演开去,其他的与清代有关的朝章典制,在曹雪芹的笔下,是否也有所避忌,进而给注释带来障碍呢?

张俊 关于国体制度,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

时,虽然使用了“狡猾之笔”,故意隐去故事发生的“朝代年纪”,但只要 we 掌握了作者特殊的艺术笔法,按迹寻踪,不被他隐蔽了去,便可发现,小说所写的仍是清代的现实、世态人情。这在一些“朝章国典”的描写上,也可以看出其迹象。可惜,这方面的词语,似乎因为顾名可以思义,所以过去的注本,或略而不注,或语焉不详,而被忽略了。如第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说到贾琏偷娶尤二姐是“违旨背亲”,犯“国孝”、“家孝”、“背亲私娶”、“停妻再娶”四层罪。这是于史有证的,而非夸大其辞,虚张声势。《大清通礼》、《清稗类钞》都有记载。如《大清通礼》卷四八说:“列后丧礼,京师及直省军民,男去冠饰,女去首饰,素服二十七日,不剃发,遏音乐百日,止婚嫁一月。”又《清稗类钞》“丧祭类”说:“皇太后、皇后之宾天,曰国丧,臣民亦皆百日不剃发,服缟素,禁止音乐婚嫁。”这在小说第五十八回也有记载。贾琏恰于老太妃丧礼中娶了尤二姐,所以说“国孝一层罪”。又《大清律例·户律》卷一〇载:“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贾琏娶尤二姐又恰在其“亲大爷”贾敬孝中,所以说“家孝一层罪”。又《大清律·男女婚姻律》记载:“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贾琏则背亲偷娶,所以说“背父母私娶一层罪”。《大清律·妻妾失序律》又规定:“若有妻更娶者,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贾琏瞒着凤姐,娶尤二姐“做二房”,所以说“停妻再娶一层罪”。正因为贾琏违背了这些有关法律的规定,让凤姐拿着了“满理”,抓住了把柄,因而她才敢那样气势汹汹,理直气壮,撒泼大闹。这类关于典章故实的词语,书中出现很多,似乎应当仔细梳理,结合史实,适当作注,以利今天的读者。

曹立波 《红楼梦》以写世情为主,社会风俗在书中的占比重大,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对贾府这个贵族世家日常的衣食住行的描写。初学者阅读至这时候,往往感到腻烦乏味,或跳过不读,结果会影响对小说思想性的理解和艺术性的欣赏。如果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琐细的词语详加注释,又缺乏相对集中的历史典籍供查阅,您是怎样注意去解决这些难点的呢?

张俊 这类词语的注释的确是比较繁难的。我

们的办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即广泛涉猎,随时留意。这都是些基础工作。三十年前,我在越南任教,授课之余,无书可读,就不断翻看随身带的一套人文版《红楼梦》(程乙本)。随看随把每回的词语摘记下来,学习日本学者方法,编成两册“红楼梦词语索引”。后来为搞《红楼》注释,我又做过“红楼梦注释资料”的笔记,有十三册,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笔记丛书》、相关清人诗文总集别集、历史典籍、诗话记事、明清戏曲小说等书中有关资料,其中涉及日常词语约一千七百余条,在注释中大多已采用。

说到“随时留意”,我想起这样一件事,与一个词条的注释有关。《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宝玉清晨起来,“小丫头使用小茶盘端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宝玉喝了两口”。这里宝玉喝的莲子红枣汤似乎不必注释,但“建莲”是否具体有所指呢?刚巧,有一天,我有事去西单,因避雨躲进桂香村食品店,不经意间看到柜台中陈列的一种莲子,标注的是“建莲”,并附有产品说明,强调这是产自福建建宁的莲子,循此线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于是给“建莲红枣汤”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建莲:即穿心白莲,因产于福建建宁县,故称‘建莲’。据《建宁县志》载,其种植始于五代梁龙德年间,历代作为贡品,俗称‘贡莲’。”这一饮食细节的描写,反映了主人公贾宝玉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

曹立波 是啊,在学术探索中,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其实包含着“孜孜以求”与“不期而遇”之间的因果联系。正因为这个校注本中的注释,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具备两方面的主要功能:一是通过校勘和排印对程甲本正文的普及,中华书局1998年不仅重新出版了师大的校注本,后来该书局出版的“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中的白文本《红楼梦》也是以此书为底本的;另一方面书中详细的注释可以作为《红楼梦》的一种随文注解的词典。

四、《新批校注〈红楼梦〉》追求

学者导读型的评批

曹立波 您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无论是八

十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于八十回本,十年前在您的主持下,我和北师大古籍室的杨健老师一道参与,对北师大馆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做了细致的查访和考证工作,我们借助内查和外调查清了版本来源。段启明先生对此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概述》、《查访录》、《考论》等文,写得朴朴实实、清清楚楚,忠实记录了事实的经过,为后世读者留下了‘真相’与‘信史’,为红学史写下了值得关注的特殊章节。”对一百二十回本的研究,您将三十多年的精力倾注在程甲本和程乙本上。从70年代中叶到80年代末,您致力于程甲本的校注。从90年代中叶至今,您潜心于程乙本的评批。这部十几年来的辛苦结晶《新批校注〈红楼梦〉》将要出版,您能谈谈这部书的新评点与清代传统的旧评点有怎样的不同吗?

张俊 十年前,我在2000年香港明清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有个发言,题目为《〈红楼梦〉评点断想》,这是我和沈治钧先生合写的,其中谈了如何运用新观点、采用传统方法对《红楼梦》重新加以评点的问题。红楼评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自乾隆中期至民国二百三十余年,代表者有脂砚斋、畸笏叟、东观主人、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王伯沆等。他们对红楼评点的产生和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评点,是现代红学发展的一个基础。评点的学术价值,取决于评点者的个人修养,也取决于评点的动机和策略。有学者将明清小说评点分为“书商型”、“文人型”、“综合型”三种基本类型。今天,我们面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容量浩大、辞旨隐微的经典之作,如何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采用传统方法,借鉴新的理论,重新诠释其原旨,认识其笔法,以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学者型”评点,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对红楼新评点的实践原则有三条:

第一,克服旧评点的“零碎性”,注意体例的完备,探求新评点的系统性。评点派过去之所以为世所诟病,反映在体例上就是因为其评点零碎,章法淆乱,各行其是。为此,我们采取了夹批和回评两种形式,批语内容注意前后贯通,以保持评点的系统完整。如小说关于“大观园女儿国”的描述,我们从第十六回筹划建园、十七回工程告竣、十八回元妃

省亲到第二十三回宝玉与众姊妹搬入大观园,从第二十七、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九、五十回诸钗“芒种饯花神”、“偶结海棠社”、“魁夺菊花诗”、“割腥啖膻”、“争联即景诗”,而至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渐次欢乐高潮;从第七十回“重建桃花社”由欢转悲,而至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诸钗遭劫,再到第七十五回至九十五回宝钗、迎春、宝玉相继搬出园中,直至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回“月夜惊幽魂”、“符水驱妖孽”大观园被封锢,逐一加批,随文点明,揭示出“大观园女儿国”之形成、发展、兴盛、遭劫、毁灭的全过程,前后关联,一气贯之。

第二,克服旧评点的“随意性”、“印象式”,注意细读文本,深入体味小说原旨。小说开端即说:“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此乃提醒读者,读此书当深切玩味,方能知其旨趣。明人袁无涯《水浒传》刻本卷首“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有论者以为,这两句话,实为小说评点的纲领性文字,是小说评点的一个主要目的。这在评点内涵上,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如何整体把握作品思想主旨,二是如何深入解析作品形式特征。尤其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由于其作者身世、作品版本、小说主旨,以及评点者的立场角度、感情内涵等原因,自然会出现诸多歧义,产生不少纷争。我们比较同意鲁迅先生所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世情书,是一部反映18世纪人情世态的小说。这是我们评点《红楼梦》的认识基点、策略原则。

第三,妥善处理继承与借鉴的关系,注意吸取红学研究成果,提高新评点的学术素质。二百余年来《红楼梦》评点虽有缺陷,但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再作评点,不应割断历史,理当发扬其优长,克服其缺陷,扬弃其糟粕,总结旧评点成果。因此,除脂批外,我们在评批中还直接引录了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的一些评语,供读者参考。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运用国外文学理论,研究红学,取得可喜成绩。新的评点,也应利用这些成果,努力沟通古今文心,以增加评点的现代气息。

曹立波 这样将有助于引导阅读,增加兴趣,解析难点。《红楼梦》的评点与其他章回小说相比,评点家当是最多的。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

将古代小说评点的基本类型归纳为“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我以为清人对《红楼梦》的评点大体有文人自娱型和书商导读型之别。脂砚斋评、王希廉评文人自娱的特点较突出,而东观阁评则明显带有书商导读的目的。近年,先后又有多家评点本问世,春兰秋菊,各具特色。您主持的评点应该不属于文人自娱型,更不可能是书商导读型。该怎样描述或概括新评本的特色呢?

张俊 学者导读型的评点风格,是我和全体参与者共同的追求、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评批时,不仅针对有关词句段加批,点明其旨意,尤其注意阐释一些重点句段的深刻内涵,帮助读者品味作品原意。如第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宝玉提到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一般不会作注,更不加批。我们则在此句下加一批说:“此一词语,清初人习用之。以为物效其灵,随目成趣,时时变幻,一派天工,乃生活之别样境界也。”并引清人李渔《闲情偶寄》卷四论“取景在借”、郑板桥《板桥题画·竹》、圆明园“天然图画”之景,及乾隆九年题诗三则材料加以证之,批曰:“宝玉借此四字评说园中景观,说理通达,思路敏捷,政老不解,动辄诃斥,迂之极矣。”

曹立波 通过这条批语,是否也可看出这部《红楼梦》新评本的特色,我觉得用“学者导读型”来概括比较恰当。与以往的评批不同的是,时代性、文学性的加强。将《红楼梦》置于明清大的文学艺术背景之下,自然凸显出这部小说的时代风貌。

张俊 为了有助于文本内容的解读,我们同时也努力注重学术性,针对一些分歧较多的学术点,试图在批语中尽量有所体现。例如,第二十二回写贾母捐资为宝钗过生日,点戏时,凤姐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庚辰本于此句上有两条眉批,一条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在此批语之后,还有一条署年“丁亥夏”的批语,学界多认为是畸笏叟所批。对这两条批语,大家看法不一。或以为,凤姐点戏,乃实有其事,并断定脂砚是女子,就是小说中人物史湘云。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梅节先生有一篇专文,他认为,畸笏所批,实际是“指文中凤姐点戏这段情节,为脂砚执笔所增入”。我们仔细比对各本“点戏”一段文字,平心而论,程乙本文气较为充足,情理较为完满,而脂评本

确有“破绽”。梅先生所说是比较有道理的。我们把这一认识写入批语,或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段文字。

同时,除所谓学术着眼点外,书中尚有很多疑难点,也颇费斟酌,值得注意。比如,宝玉在秦氏屋里午睡,秦氏嘱咐小丫头们在檐下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有何寓意?宁国府有一轩馆,为什么取名逗蜂轩?贾府中的炕,究竟有几种形制?茅厮是否茅厕的形讹?邢夫人明明住在荣府的东院,为什么称她“北院太太”?梦稿本与程乙本究竟有何关系?宝钗会不会说“诗从胡说来”这样的“粗话”?诸如此类,我们都试图征引材料,钩玄提要,做一些评点,提供读者思考。

曹立波 是啊,导读性与学术性的兼顾,参与评点工作的沈治钧师兄也是这样说的。胡文彬先生曾在评议意见中说:“这是程乙本诞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批点’形式,凸显出评者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表现了评点者对读者的阅读关怀,必将起到一种有益的‘导读’作用,这种新的尝试应该得到鼓励。”的确,这部兼顾“学术眼光”与“阅读关怀”的学者导读型《新批校注〈红楼梦〉》,值得期待。除了评批,还有正文的校注问题。您以程乙本为底本,据说程乙本上的一些异文,甚至异体字大都予以保留。您觉得这一版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张俊 有的,我们校订的原则,就是“慎重对待,不轻改底本,保持原貌,以存其真”。我始终认为,对那些体现了版本文字特色的词语,不要轻易作改。保留这些异文,还可以为研究者多提供些语言史料。在校注、评批过程中,我写了几篇《程本红楼语词校读札记》随笔短文,比如第二十回,写黛玉与宝玉斗嘴和好,黛玉说:“回来伤了风,又该讹着吵吃的了。”程乙本中“讹着”二字,各本歧出。现行脂评排印本,多作“饿着”,人文版校订程乙本保持旧貌,作“讹着”。《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收录有“讹”字多个义项,而“讹着”一词,不见于这两种通行辞书。惟上世纪30年代编纂的《国语辞典》采收此词,举例即为黛玉所说的那句话。用一“讹”字,写宝玉性格的娇宠、行为的憨顽,或更贴合一些。至于说“饿着”是贾府“秋季养生经”,那是就医学而言,另当别论。其实,第五十三回写晴雯染病、第一百九回写贾母不适,都以“净饿”秘法治疗,程

乙本与诸本同。可见在乙本修订者看来,“讹着”与“饿着”两者的语义是不同的。再者,程乙本上有一些刻意增饰的语句,也有其理路。如第六回贾蓉向凤姐借炕屏的情节中,程乙本有贾蓉“满脸笑容的瞅着凤姐”一语,及凤姐“忽然把脸一红”六个字,为其独有文字。对这种改动,评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其实,通观全书可知,程乙本对凤姐和贾蓉之间暧昧关系的渲染,并非突发奇想。程甲本第六十八回凤姐大闹宁国府一些细节的描写,当是乙本写两人暧昧关系的主要凭藉。

曹立波 从您所列举的程乙本上特殊的字、词、句可知,对版本异文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勘对文字,从中也能考察出历史信息、异文的来由以及语言史料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五、京师文科学风的承传

曹立波 我曾看到您的一篇文章,题为《治学严谨——我校文科学风的显著特点》,发表在1997年《师大周报》上。希望您能简单谈一下北师大文科学风的特点,这是师大学子都关注的。

张俊 在一次关于“启功先生语言学著作学术研讨会”上,有位校外专家发言时说:师大的学风,与北京某大学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值得好好总结。对此,我也有同感,会后我便写了那篇短文。就文史而言,治学严谨,注重实证,确实是我校文科学风的特点之一。翻开北师大的“校史”,可以看到,几十年来,曾在国文系任教的高步瀛、吴承仕、朱希祖、马裕藻、杨树达等专家教授,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教学,多体现出这种精神。如高步瀛先生,他编选的《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两书,资料丰富,考订详赡,引用材料着重第一手,对旧注的讹误,时有订正,据说他讲课,也很重事实、重证据,考证翔实精确,为同侪所敬服。学生对他所注释的诗文,极为珍视,得其一篇,出校教学,可免去翻检参考资料之劳。有人认为,对历史的描述,“更需要理解和判断,实证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甚至解决不了主要问题”。这样讲,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大量资料的掌握和考辨,毕竟是研究的基础。

曹立波 您读大学的时候,对授课老师的言传

身教一定有更为具体的感受吧？

张俊 是的。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中文系读书时,当时授课的老师,如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的刘盼遂、王汝弼、启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专题课的陆宗达、萧璋先生等,他们的教学和著述,朴实、严谨,无不体现出北师大的传统学风。比如刘盼遂先生曾受业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汝弼先生则是高步瀛先生的学生,他们对文字、音韵、训诂都很有研究,做学问重事实,重证据。刘先生给我们讲过《古诗十九首》、王先生讲过《离骚》,对作品中的词语、典故,总是能考稽史料,列举例证,旁征博引,以释其义。还有,刘先生读书,很喜欢把自己考释、订讹、辑佚的点滴心得,批注于书眉或页侧。往往三言两语,独具卓见。一次,我翻阅“文革”时被抄、后归藏古籍组的刘先生的部分藏书,记得在枝巢子《旧京琐记》上有刘先生的几十条批注。其中有这样一条,原文说“按行裳即今之马褂也”,刘先生于书的上端批云:“行裳非马褂,盖俗所称战裙也。马褂不得为之裳。”后来,看到新排印本《旧京琐记》,我便想,如果整理者有机会看到刘先生的这些批注,或可改正书中的一些错讹,当是有益于读者的。

曹立波 您在北师大留校工作之后,曾与启功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并一起校注过程甲本《红楼梦》,能谈谈对他的印象吗?

张俊 启功先生曾受教于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据介绍,陈垣先生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倡导材料准备要“竭泽而渔”。启先生继承了老师的这种治学精神。他的授课和著述,也很重视实证,这从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丛稿》“论文卷”、“题跋卷”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现象论丛》等著作中便可看出来。我们在校注程甲本《红楼梦》时,他虽然未能参加初稿注释词条的编写,但选择底本、拟定体例,是由他主持的。他并为校注本写了“序言”,结合实例,对书中涉及的俗语、服装、器物、官职、习俗、社会关系、虚实辨别等诸多问题作了具体的阐释和考辨。因为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这篇序言,对引导读者认真阅读《红楼》文本,很有帮助。同时,他对我写的“校注说明”,从版本角度作了认真修改。比如,在介绍程刻本的流传时,他亲笔加了这样一段话:“程氏修

改程甲本时,可能是随改随刻的,所以现在所传的程刻本中,改刻的页子多寡不等。所以现在找一个没换改刻页子的纯甲本固然不易,或想找一个改刻全了的纯乙本也不易的。”在师大校注本出版前,启先生还写过一篇《读红楼梦札记》的红学论文,得到学界的赞赏,启先生也比较看重这篇文章。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师大本时,我们便将其附于书后。这样,前有先生的“序言”,后附“札记”,实为师大本增色不少。

曹立波 启功先生的“札记”具体分析了这部小说中的虚实问题,“序言”中对《红楼梦》虚构的成分也有所强调。比如,他认为小说中所写的官职有许多是“无迹可寻”的。古代文献研究中,如果没有丰厚的资料和充分的调研,不敢轻言“无迹可寻”。张老师,您对此是怎样理解的呢?

张俊 启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红学家、一位文物鉴定的权威,有他自己的看法,理所当然。关于曹雪芹或《红楼梦》,如有什么新发现、新资料,红学界都愿意征询启先生的看法。你还记得,在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专家座谈会上,启先生特别强调了“避讳”问题,而对抄本的价值,因未来得及仔细查看原书,并未表示意见。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而对上世纪70年代香山发现的所谓曹雪芹故居、90年代通县发现的所谓“曹雪芹墓石”,则都认为是“不靠谱”的事。他曾写过一首《南乡子》(友人访“曹雪芹故居”余未克往),词前小序曰:“友人联袂至西郊访‘曹雪芹故居’,余因病未克偕往。佳什联翩,余亦愧难继作。”正文是:“一代大文豪。晚境凄凉不自聊。闻道故居犹可觅,西郊。仿佛门前剩小桥。

访古客相邀,发现诗篇壁上抄。愧我无从参议论,没瞧。‘自作新词韵最娇’。”语言诙谐,观点鲜明。这就是启先生的风格。当然,这只是启先生的一家之言,相信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就是曹雪芹故居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肯定此处就是现在的“曹雪芹纪念馆”。

曹立波 我们谈了多位京师先贤,能具体谈谈“治学严谨,注重实证”的京师学风对您的影响吗?

张俊 我在讲授和编写中国古代小说史时,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因为资料缺乏,考证不详,有些作家作品难以准确定位,而影响到小说史的描述。比

如出现于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它的开山之作是哪一种,一直众说不一。有些文学史著作和书目,认为序于明万历年间的《吴江雪》是第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但有的学者考证,这部小说实际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前后相距六十年。后来有朋友介绍,发现一抄本《红白花传》,当是明末作品,或为才子佳人小说开山之作,但一些学者指出,这部书实是韩国作品。又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校的《中国古代孤本小说》一书,其中收录了一种才子佳人小说《山水情》。据“编校说明”,此书当刊于明末清初之间,仅存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它是否为最早一种才子佳人小说,因没有看到原书,难以遽下结论。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些作品的考定,资料的辨析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描述小说史的问题。

曹立波 您在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课程时,强调史料等实证材料的重要性。引言中讲到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史回顾时,肯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实为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这部书是1920至1924年间,鲁迅先生在北大、北师大授课的讲稿,从讲义的角度说,鲁迅治小说的方法,也是京师学风的体现。我们爱读这部书,既源于其翔实的考证,也因其敏锐的评论。那么您推重这部书,是倾向“史”,还是侧重于“论”呢?

张俊 阿英先生称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鲁迅书中这二十八个篇章,按时代顺序对小说流派加以描述,奠定了今天小说史编写的基本格局。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他当年所见到的小说较为有限,只占今天所知的五分之一。然而,他看到的

小说虽有限,但小说史家的眼光是敏锐的。书中大多数评价直到今天还是可以借鉴的。因而,治小说史,除了动手搜集梳理资料,史家的眼光也是必要的。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的,二是博证的,两者互为补充,构成这部书的鲜明特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19世纪的龚自珍、魏源等学者也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学问。龚自珍在《抱小》中说:“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这里,“劬”是辛勤,孜孜以求;“涩”是立住脚、不动摇。希望在研究学问时,一定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像郑振铎先生所说的那样,研究者一定在心里千百次地喊“拿证据来”。当然,在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今天,也必须加强文学理论的学习,如果没有一种理论思想的统领,大量的资料也会变得支离破碎,不得要领。

曹立波 顾炎武的“博赡而能通贯”,龚自珍的“求劬”和“获创”,我从您的课上和书中都有所体悟。您的言传身教也让学生们感受到京师学风的薪火相传。您所谈的问题,从小说史到世情书,再到《红楼梦》的注释、评批与论述,对于红学,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都十分重要。

张俊 谢谢!我略谈了一些治学的经历和体会,也期待能有机会与同行们交流探讨。为了写好这篇访谈稿,你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谢谢你,也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给予的关心和鼓励。

责任编辑 山木